

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位于南京中山门外卫岗,后来为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所在地



宋美龄与遗族学校

程薇薇

(孙中山纪念馆,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江苏南京,210042)

一、精心修建学校以慰忠魂

1912年,孙中山在南京建立临时政府时,考虑到辛亥革命中烈士子女和因战争失去亲人的孤儿们的命运,决定成立南京孤儿院,任命黄兴的夫人徐宗汉^[1]为院长,负责筹建工作。后因袁世凯称帝,孙中山和黄兴发动了二次革命。革命失败后,孙、黄被通缉,孤儿院被迫停办。一些慈善人士把孤儿院的院生们收养到南京红山南朝古寺嘉善寺。为防止反动军阀张勋的破坏,对外称慈善收容所,属宗教界管理。

1926年,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很多将士牺牲。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随后,南京孤儿院恢复。

因体念阵亡将士遗族大都缺乏教育培养,应设立学校予以栽培,慰藉忠魂而抚养遗孤,1928年10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决议,决定在南京紫金山南麓的中山陵园附近,创办一所革命烈士子弟学校,专门收容北伐中阵亡将士子女和辛亥革命中牺牲的先烈后代,由国家培养教育。学校定名为“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设立遗族学校筹备委员会,推荐蔡元培、何应钦、宋庆龄、叶楚傖、宋美龄、何香凝、王文湘、李德全、刘纪文、江恒源、傅焕光担任筹备委员。

1928年11月学校开始筹备。时任中山陵园主任技师的傅焕光负责在中山陵附近选择校址。几经规划,最终选定校址位于四方城前钟汤路之北高冈区,占地四百余亩。中山陵的建筑师吕彦直画了校舍的地盘图。吕彦直生病,改由朱葆初继续绘制出校舍的详细建筑图纸。1929年2月遗族学校开工兴建,先建小学部的校舍,之后再建中学部校舍及其他建筑。由于经费困难,校舍分几期招标兴建。每次招标又以开价最

低的建筑厂家为得标人。如此,工程进展十分缓慢,而各省国民革命军烈士的遗孤,已经纷纷到南京来要求上学。

在这种情况下,遗族学校筹备处决定先在南京城内的大仓园设立临时校舍招生,学食等费用均由学校供给。1929年4月开学上课时学生共有300多人。设有小学六个年级,入学年龄6岁至16岁。另外还设有职工科农事班,入学者年龄最大不超过20岁。韩恢烈士的儿子韩定国,当时只有12岁,收入遗族学校后,被学校教养兼施。奉安大典前,孙中山先生的灵柩停放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时,韩定国还以遗族学校学生代表的身份,到设在中央党部的灵堂参加公祭。

1929年秋,四方城前的新校舍落成,遗族学校由市区临时校舍迁到新校舍。1930年冬,因学校扩大,将女生单独划出,另设遗族女校。起初在新街口附近的羊皮巷、三元巷一带建临时校舍,1933年宋美龄指拨遗族学校的农场地100亩建筑女校。1934年,宋霭龄又在上海召集会议,将上海妇女救护伤兵医院理事会余款10万元作为遗族女校建筑经费。女校由基泰建筑设计监工,1935年9月建成。

二、独具匠心的建设与管理

遗族学校建成后,原筹备委员会改称校董会。刚开始是由宋庆龄任校长,宋美龄任校董事会主席,章绳以为校务主任。宋庆龄十分关心遗族学校,她曾对教师们说:遗族学校是为纪念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而设立,新校舍建筑在中山陵墓附近,教育对象是追随中山先生革命的先烈遗族,因此,一定要为彻底实现中山先生的革命理想和教育主张而努力工作。当时宋庆龄在

参加完孙中山的移灵活动后就离开国内,在欧洲从事国际反帝大同盟的工作。因此,事实上遗族学校从筹备到成立直至最后解散,一切校务均由宋美龄负责。

宋美龄将办遗族学校当成一项事业,热心地参与各项管理,并投入了相当多的精力。宋美龄亲自抓学校的校务管理。宋美龄肩负着管理遗族男女两校的责任,一心希望将其办成中国的模范学校。当宋美龄不在南京时,则由两校校务委员会随时处理校务,并执行管理监督权,而后向宋美龄汇报,学校的重大事情都由宋美龄决定。

1. 校舍及设备

新校舍占地512亩,以朴实、实用、牢固为原则,平房采用中国式样。学校大小房屋共有38座,不但有小学部,还有中学部。大礼堂、教室、特殊教室、办公室、门房、会客室、学生教职人员宿舍、图书馆、运动场、网球场、篮球场、足球场、膳堂、医院、牛奶房、农舍、工场、厨房、盥洗室、浴室、厕所、洗衣室、理发室、汽车间等,各种教学及配套设施一应俱全。

中学部先办农科,校舍南部特设农场,占地约1000亩,分农艺、园艺、畜牧三科。农艺科种植重要作物和畜用饲料;园艺科分观赏园艺与生产园艺两种,生产园艺又注重清洁;畜牧科已办乳牛场,又将添设鸡场,乳牛多纯种,极注意卫生。^[2]

图书仪器标本经过历年的购置,不包括参考实习之用,共有书籍3247种、5642册,杂志175种、3212册,图表126种。仪器标本计有显微镜7架、解剖器1副、扩大镜4具、植矿标本1286件、采集器具十余件、化学器械259件、药品372件。校具如课桌椅、厨架之类,普通用具有3647件,课桌椅柜橱等教室用具达1382件,各种教具计2070件。农具有大小洋犁9架、播种机3架、中耕机3架、其他农具约600件,又耕牛4头。校董



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的学生们

事会拨款定购书籍并购置机器耕具。^[3]

2. 合理完善的组织及编制

学校设总务、教导、养育三处,分掌校务。总务处设文书、事务、会计、注册、体育五科。教导处设小学部、农业中学二部,小学部设教导、研究两科,中学部设教导、研究、场务、推广四科。养育处设保健、保育、舍务三科。此外设各种委员会。学校分小学部和中学部。小学部分高、低两阶段。具有一二三年级程度者,成低年级组一阶段;具有四五年级程度者,成高年级组一阶段。全部共有九级。各级学生人数不多时暂并成合级,用复式教室,有一年、二年复式一级。三年上期、三年下期、四年上期、四年下期、五年上期、五年下期、六年上期、六年下期,单式八级。各级科目如读文、作文、算术等采用能力分组办法,分成若干组教学,在学月测验后各组得调用升降并打通各级界限。农业中学部分初、中、高三阶段,均用单式教学,现有一年、二年、三年、四年、五年五级。具有一二年级程度者,成初级组一阶段;具有三四年级程度者,成中级组一阶段;具有五六年级程度者,成高级组一阶段。^[4]

3. 入学办法

国民革命军阵亡军人的子弟,都可以申请入学。入学手续较为严格。先向学校索取调查表,按表正确填写,送学校审查(年龄规定6岁至16岁),再由学校呈请校董会或校长审核,经批准后参与入学测验(分笔试、口试、体格检查三种),经测验合格,依次递补入学。阵亡军人若有子女较多的,限收二人,若有亲生子女,则其弟妹不能入学。凡是阵亡军人的遗族在入学前须填写志愿书及保证书,所请保证人必须在南京当地有正当职业及确定住址,亲自到学校表示绝对担负一切应负之责。审查合格的遗族接到入学通知书后立即启程来南京。已在南京的,亦须如期入学。入学时由亲属及保证人陪伴送到学校办理入学手续:一、往注册科报到;二、由校务主任考询一切;三、检查身体;四、往小学部或中学部参与编级测验;五、向事务科领生活用品及课业用品;六、往宿务科编定宿舍榻位及饭堂席次。新生入学后试读三个月,合格者则为正式生,发入学证书,否则令其退学。无论何时,若发现并非真实遗族,或学业、品性、身体有一项不合格,则随时令其退学或停学。^[5]

三、科学合理的教学理念

遗族学校的教育包含养育与教学,全面照顾学生的衣、食、医等方面,既融合了西方的职业性教育,又结合

中国的国情,实行传统文化教育,既有书本知识的学习,又注重社会实践和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鼓励学生手脑并用,自食其力,以服务社会、报效国家为己任。1930年,孙中山的老朋友、美国人林白克来校参观,听了宋美龄的介绍,称赞遗族学校为当今“东方第一所新兴学校”。宋美龄得此嘉许,引以为荣,她重申:“我希望他们能够具有中国旧道德和现代新知识,发展蓬勃的精神,高尚的志趣,成为建造新中国的柱石。”

1. 大家庭式的教养

由于校长宋庆龄忙于国际反帝同盟的工作,所以,遗族学校的校长职务,由宋美龄全权代理。她每周至少抽三天时间到学校,处理校务问题。她对在遗族学校工作的教职员工作要求很严,要大家以事业为重,作好表率。她常常陪同蒋介石选择在早晨6点学生起床前,或晚上学生就寝后,到校视察。

宋美龄很注意学生的衣食住行,要求全校变成一个大家庭。学校成立了一个特殊组织——家务处,负责处理学生衣食住及其他一切生活。家务处规定每一寝室均由训导教师负指导之责。为学生制四季衣服鞋袜,烹制有营养的膳食,置备被褥枕席等等。入学的小同学晚上有女教师陪同住宿,随时照料寒暖。平时一日三餐,都实行教师与学生同桌吃饭的制度,以便了解饮食的卫生和营养情况。为学生打预防针,或有病为之治疗。年幼学生能力薄弱,特设保育员若干人,专负保育之责。其他如理发则有理发室,沐浴则有浴室。凡关于生活方面一切琐事,均予以指导或扶助。

小学低年级儿童日常活动情形分为故事、研究、作业和游戏四种,采用大单元学习,以直观与游戏为教育方法,更视其能力差异而随时升降教学时间。以教学中心问题为出发点,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力谋各科之间的联系。国文、算术两科以能力分组,在同一时间学习,以便升降,课程与教育部新颁的暂行标准差别不大,惟高组特设职业性科目,以个性适应而树自立为基础。中学教学目标根据学生兴趣能力定有三种:一是养成实地经营农业人才;二是养成农村指导与农业推广人才;三是养成农业改良的技术人才。实质方面使教材与教学目标相符,每次上课及实习材料分量的支配务求适当,形式方面给学生自动学习的机会,更对学科的性质提出问题,研究讨论尤重课前预习(制有各科预习簿),以增加教育的效率。教学上的讨论事项由各



宋美龄、蒋介石与童子军们在一起

学科研究会随时开会,研究改进教育。^[6]

对于教师的健康,宋美龄非常关心,要求保持校园的整洁,在校舍四周栽种花木,同时注意教室、宿舍、饭堂,以及厨房、厕所、盥洗室的清洁卫生,尤其是防止蚊蝇,清除秽物。她认为这些都是全校师生健康的关键。1930年入秋以后,不少学生患病,除了在本校的医院诊治外,有的学生还被送往中央医院治疗。宋美龄曾携带果品,偕同校务主任章绳以,到中央医院慰问住院的学生。

2. 注重实际的职业化教育

宋美龄对于教育问题颇有见解。为了把遗族学校办成一所模范学校,把学生培养成社会上的模范人物,她特别强调办学要注重实际。她要求学校的行政首先要注重实际,所订的规章最好是大纲,而不必繁琐,因为繁琐就不易执行。其次,教学上要注重实际,教员上课应当选择学生能领会而且实用的加以讲解。她要求学生在学习时注重实际,时时准备自立。

学生学习及生活都在学校,因此,学校的训导责任尤其重大。根据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教育精神及亲爱精诚的遗训,确定训育目标为精神革命化、思想科学化、体魄军人化、行为纪律化、生活劳动化、兴趣艺术化、组织社会化、学校家庭化。为使得目标实现,还制订了十则信条。

遗族学校极为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除读书识字学问外,还注重双手的训练。“力求实用”是学校教育的目标。对于入学的儿童,从小就培养他们树立“手脑并用,双手万能”的思想,不依赖他人,独立生活,自己处理自己的事务。小学高年级特别注意职业陶冶。到了中学阶段,注重应用学科的训练,观察时代需要与急

求民生主义的实现,还对学生进行职业教育。

宋美龄很注重农业,认为农业是建国的基础。根据她的意见,遗族学校设立了农科,初中、高中共6年。这6年的时间里,学生除了学习中文、英文、数、理、化等课程以外,还有很重要的课程,即农业知识的学习和农业技术的训练,使学生学会一套务农的本领。学校中学先设农科,使得人人均能自食其力。宋美龄通过为她治病的美籍医生米勒的介绍,为学校聘请了一位懂农业的美籍顾问孔保罗。她又从上海迁来一个良种乳牛场,让学生实习。这个乳牛场所产的牛奶,是当时南京最好的。对于女生,则注重家庭职业训练,学会制图、摇线、织袜、洗染、熨烫、缝纫、刺绣等本领。那时,中山门内园艺场还推销男生生产的苗木、花卉、果木、蔬菜;新街口羊皮巷口设有遗族商店,销售女校学生生产的农产品和工艺品。

遗族学校的学生不但在校内注重实践,还曾到社会上进行服务。这也是宋美龄倡导的。1930年代初期,她在南京接见过鼓吹平民教育的晏阳初^[6]以后,决定在遗族学校也成立学生乡村服务团,以南京近郊为服务范围。服务的内容则包括设一所惠农平民学校,负责扫盲,一个施诊所,为农民看病,和为民众放映电影等项。由于有宋美龄的关注,一些机构的热心协助,服务团一度搞得轰轰烈烈,迁都重庆前夕才结束。

四、抗战全面爆发后的妥善安置

抗战全面爆发后,遗族学校被迫停办。宋美龄对此作了妥善的安置。她要求交通部门优先安排船只,将遗族学校的学生疏散到大后方,并让这些学生分散



国民革命军遗族低年级的孩子们听老师讲故事

到地方学校继续学习。在此期间,她一直关心着遗族学校学生的教育。

1935年4月、5月、7月,宋美龄分别由贵阳、成都和峨眉山致书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讲述其“西南漫游”。4月的信中这样写道:“我离开了你们虽然很久而且很远,但时时总是在想念着你们。当我深入内地目睹一般人民困苦状况的时候,就想着现在的你们真幸运,能够很安乐的生活着,而且受着良好的教育,能够寻得增进德业的门径,将来又能够有帮助同胞服务国家的机会,你们真是十分幸运!……”^[7]

1937年冬,南京沦陷,遗族学校校舍和教员宿舍几乎全部被毁,男校校舍幸存。抗战胜利之后,许多抗日阵亡将士的子女需要及时收容教养,宋美龄决定恢复遗族学校。经过一年筹备,该校于1946年秋季在旧址开学。其招生原则为:必须是抗日阵亡将士的子弟,并经校长蒋介石批准才可入学。由于女校校舍未及时修复,故当时只好先招收具有初、高中程度的男生。

遗族学校复校前后,一部分经过八年抗战已经大学毕业的前期学生被陆续调回母校,有的在校务处工作,有的担任各科教师,也有的在医务室当医师。他们认真负责、胜任愉快。宋美龄曾向美联社的记者表示,她一生中最满意的事情,就是遗族学校办得成功。

五、学校南迁

1949年初,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统治行将崩溃,遗族学校便开始作南迁的准备。这年农历正月初一,遗族学校师生从南京出发,先到杭州。此后,一退再(下转第51页)



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的学生列队步入学校

们便靠这长驱直入的打破资本阶级。”由此可见,恽代英“与资本家决斗”的策略和方式具有鲜明的温和渐进倾向,理想的工厂制度也即乡村中“共同生活”设想在城市中的迁移和投射,这种设想是把有道德的集体主义生活作为社会改造的良方。

“未来之梦”中对乡村和城市的社会改造及路径设想,为观察认识道德乌托邦提供了一个切入点。道德乌托邦的美善可能由以下想象中的社会场景所决定:人们一道生活,财产公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男女平等,重视教育,没有强权欺凌、没有剥削压迫、没有尔虞我诈,过一种有道德的集体主义生活。总之,道德乌托邦是一个复杂含混的概念体系,是恽代英这个年轻的理想主义者的想象世界,其中,道德主义的旗帜高高飘扬,并洋溢着对中国传统政治理想的眷恋和对西方思想资源的钦慕。

四

由上可知,恽代英的道德理想主义者形象大致包括个人的修身形象,和对社会国家的乌托邦想象形象,以及实现二者联结的经世形象。恽代英的道德理想主

义者形象是在中国近代转型时代出现的。恽代英的家世和教育背景以及他个人的性格禀赋为该形象的生成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在宋明儒学的熏陶下,一定程度上,恽代英是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角色呈现于那个时代的,这位传统知识分子一方面遵循恪守传统的道德规范,一方面以天下为己任,力图实现天下大同。个人的纯净操守人格与天下大同的瑰丽梦想的一个勾连即是投身政治活动,改良社会痼疾,实现社会政治的清明美善。

总之,恽代英的道德理想主义者形象并不是他本身所刻意塑造的,更多的是由于在近代转型时代中国面临整体主义危机的情境下,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宋明儒学“大学模式”的滋养浸润而生发的。因此,恽代英的道德理想主义者形象毋宁说是一种传统知识分子道德形象在近代转型时代民族主义情绪高扬下的一种延伸和舒展。个人道德的不断完善有利于“新人”——革命者——的诞生,乌托邦的梦想促动了人们对未来理想社会——共产主义——的无上渴望,因此,这种道德理想主义一定程度上契合了革命道德和革命理想主义,从而推动了恽代英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向。

(上接第63页)

退,在南昌、广州又停留了一段时间,直到人民解放军占领广州前夕,遗族学校的300多名师生才迁往台北。

遗族学校迁到台北以后,学生在台湾省立师范大学附中寄读,即所谓“校内有校”。台师大附中是一所著名的学校,遗族学校学生在这里寄读,学习和生活条件都比较好。此后,遗族学校不再招生,学生逐年毕业,直到1953年,送走了最后一批学生,该校即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如今,在海峡两岸,都有不少当年遗族学校的毕业生。大陆毕业的遗族学校学生,不少人已成为高级工程师、专家、学者。在台湾毕业的遗族学校学生,很多考上了大学、军事学院及护理、农业、美术、音乐等专科学校,台湾当局供给他们生活费用,对于出国留学,也给予支持和资助。据台湾出版的《遗族校友通讯》统计,遗族学校学生在美国留学获博士学位的达50多人。

1986年10月,90高龄的宋美龄从美国返回台湾,参加蒋介石百年诞辰纪念大会。1987年1月18日,她接见了在台湾的200多名遗族学校毕业生,并与他们举行茶会,欢聚一堂,品茗忆当年。足见宋美龄对遗族学校的感情之深。

参考文献

[1]徐宗汉(1877-1944),原名徐佩莹,原籍广东珠海市北岭村,出生于上海一个买办兼茶商家庭,是民国时期的社会活动家,民主革命家,儿童教育家。她积极投身民主革命洪流,领军起义、提倡女权、倡办女学,是辛亥革命的女杰和妇女运动的先驱。她为反对袁世凯独裁、抗击日本侵华及社会公益事业做出卓著贡献,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挚友和中国贫儿教育的开创者。

[2][3][4][5]中国水土保持学会、中国老教授协会林业专业委员会编:《傅焕光文集》,中国林业出版社,2008年,第20-22页。

[6]晏阳初,(1890-1990),四川巴中人,中国平民教育家和乡村建设家。他认为中国的大患是民众的贫、愚、弱、私“四大病”,主张通过办平民学校,对民众首先是农民,先教识字,再实施生计、文艺、卫生和公民“四大教育”,培养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和团结力,以造就“新民”,并主张在农村实现政治、教育、经济、自卫、卫生和礼俗“六大整体建设”,从而达到强国救国的目的。

[7]杨树标、杨菁:《百年宋美龄》,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4-35页。